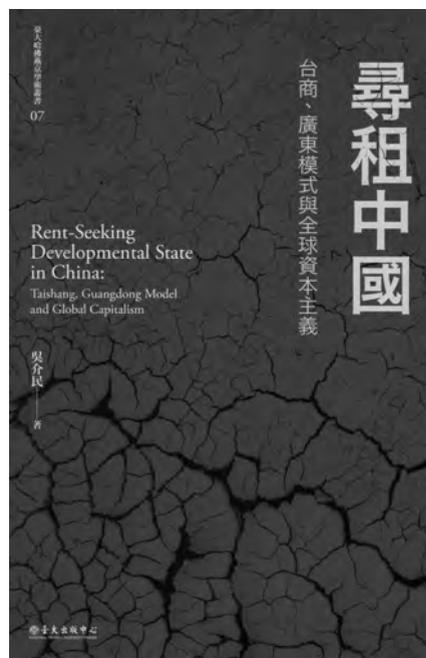


如何講述中國故事

——評吳介民《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 宋 磊

在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整全性分析之中，第一種講述方式重視資源配置，以宏觀層面的生產關係為中心；第二種講述方式強調資源使用，以微觀層面的生產組織方式為中心。《尋租中國》的主要價值就在於完善了第二種講述方式。



吳介民：《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9）。

近二十年來，如何講述中國故事，即如何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對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作出解讀，逐漸成為相關研究領域的華

商學者最為關心的研究主題之一，大量研究成果不斷湧現。總體上，這些研究成果可以分為兩類：一類致力於提供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具體問題的專門性解釋，另一類試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給出整全性分析。在現階段，前者已經取得了關鍵進展，中國經濟的組織結構、政府的價值取向、官員晉升體制、政商關係等研究領域都出現了一批重要文獻^①；雖然後者也在增多，但是為學術界公認的突破尚未出現。這種研究格局的形成與學者採用的研究方法不無關係，正如筆者在一篇文章指出：「現階段關於中國經濟模式的研究尚未完成從經濟意識形態向社會科學理論的轉變」，因此「羅列事實成為主要的講述方法」^②。

在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整全性分析之中，存在兩種中國故事的講述方式：第一種講述方式重視資源配置，以宏觀層面的生產關係（抽象的制度安排，集中於市場或私有制與政府或國有制的討論）為中

心；第二種講述方式強調資源使用，以微觀層面的生產組織方式（企業的生產活動和政企互動）為中心。相對而言，前者是主流，具有較長的發展歷史；後者是支流，近年方開始出現。目前採取第二種講述方式的學者為數不多，能夠將兩種講述方式有效結合的學者更為少見。然而，如果忽視第二種講述方式，那麼我們將難以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全貌與特徵。在筆者看來，台灣學者吳介民新近的專著《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引用只註頁碼）的主要價值就在於完善了這種仍然處於發展之中的講述方式。

一 主要內容與核心論點

在提示研究問題的導論與展望中國前景的結論之外，本書由七章構成：第一章概括先行研究的貢獻與局限，提出本書的分析框架；第二章從台商的視角出發，梳理了廣東模式的起源、特徵與變遷；第三至第四章圍繞典型的台資企業進行案例研究，以工繳費（亦即加工費）等制度安排為核心，詳細地展示了以地方政府和台商為主體的「尋租」活動如何發生，並在內外環境轉變下遭遇的困難；第五章討論勞工階層如何被排斥到「地方成長聯盟」之外，遭受地方政府和外企的雙重剝削；第六章再次通過案例分析，研究了在廣東模式逐漸失效的大背景之下，台商如何應對變化；第七章總結本書的理論貢獻。

上文對於本書的主要內容與核心論點的介紹是極為簡略的，但是仍然可以讓我們意識到本書的結構細密、內容複雜。有趣的是，這種細密與複雜也體現在標題之中。

本書有正副兩個標題，兩者在邏輯上具有聯繫。副標題「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概括了本書的主要論點。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主要論點涉及兩種租金，以及兩類主體圍繞這兩種租金所展開的活動。一方面，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上積極地創設「政策租金」以尋求收益；另一方面，台商因其「身份資本」（中國政府因為統戰需要而賦予台資「特殊優惠」）和產業優勢具有「租值」，所以積極地利用這種身份獲取超額利潤（頁15-17）。作者認為，中國政府和台商共同推動了廣東模式的出現，為中國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出發點。中國模式在這兩種互為依託的「尋租」活動之中出現，因此中國也可以被概括為「尋租發展型國家」（rent-seeking developmental state，頁339）。在這個意義上，本書的正標題「尋租中國」是對於上述認識的抽象表達。當然，如作者多次指出，這種發展模式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而這些成本主要由勞工階層和自然環境承擔。

中國經濟成長的複雜性決定了任何試圖給出整全性解釋的研究必定是複雜的，本書並非例外。一般來說，中國經濟成長的複雜性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中國經濟成長是國內改革和國際分工體系共同作用的結果；其次，中國經

作者認為，中國政府和台商共同推動了廣東模式的出現，為中國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出發點。中國模式在這兩種互為依託的「尋租」活動之中出現，因此中國也可以被概括為「尋租發展型國家」。

本書將地方政府和包括台商在內的外資企業構成的「地方成長聯盟」如何讓全球價值鏈嵌入地方經濟發展作為分析焦點，着重討論了嵌入機制和台商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變遷。

濟成長的微觀主體是具有不同所有制特徵的內資與外資企業；再次，中國經濟成長在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特徵。作者意識到這些複雜性並進行了回應。本書將地方政府和包括台商在內的外資企業構成的「地方成長聯盟」如何讓全球價值鏈嵌入地方經濟發展作為分析焦點，着重討論了嵌入機制和台商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變遷。具體來說，作者將價值鏈的全球展開視作海外華人資金、特別是台灣製造業資金進入中國大陸的起點，指出台商推動了廣東模式的出現。隨着廣東模式在大陸其他地區逐步擴散，所謂「中國模式」開始形成（頁26-27）。

在這樣的研究思路之下，作者重點分析了「地方成長聯盟」如何通過諸如「工繳費」和「外匯分成」等啟動生產活動、抑制勞工利益的制度安排來分享租金，並對嵌入當地的價值鏈進行治理（頁110-13）。作者注意到最早借助價值鏈的全球展開進入中國大陸的外來資本是港資企業（頁80）。但他認為港台製造業企業在管理方式上高度接近，都具有低工資、低福利、去技術的特徵（頁3-6）。在總體上，筆者無意挑戰上述判斷。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港台企業先於歐美日企業進入大陸，它們扮演了向大陸傳播現代管理方法的先鋒角色。另外，部分港台企業在技術意義上是大陸相關產業的標桿。比如，作者重視的台積電的大陸工廠顯然是大陸芯片產業的領軍者之一（頁370-72）^③。

作者認為，儘管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台商的地位開始下降，但是在管理思路上具有台商烙印的大陸

企業（「台資系陸資廠」，頁60）的競爭力有所提升，廣東模式已經向全國傳播（頁21）。遵循這樣的論證過程，本書的主要論點——借助全球價值鏈實現擴張的台商塑造廣東模式，廣東模式奠定中國模式的基礎——在2010年代仍然基本成立。

二 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述方式

筆者首先要讚許的是，本書的閱讀體驗很好。作者的學術背景橫跨經濟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家擅長的田野調查和細膩描述與政治經濟學者特有的宏大視角和冷峻分析，在本書之中自然地融為一體。另外，本書還運用了經濟地理學、企業管理學等研究領域的學術資源。值得肯定的是，作者與這些領域的先行研究進行的對話並非淺嘗則止，而是與本書的論述有緊密關係。例如，作者在提及台陽公司結束在中國二十餘年的經營時，便指出台商新一代領導人的管理風格偏向歐美，對應酬、索賄等企業文化和軍事化管理較為抗拒，且對地方政府派駐的「廠長」並不信任，從企業管理的角度展示了除經營成本日增之外、台商內部的改變對廣東模式帶來的挑戰（頁178-86）。

作者倡導的用於描述中國經濟發展的概念，如「新重商主義」（「以國家權力統整資本，背後驅動力是經濟民族主義」，頁7）、「地方成長聯盟」、「機構化尋租」（「在大規模全球化的驅動下，地方政府的尋租

活動被制度化、組織化、日常化」，頁25)、「在地鑲嵌治理」(「在地體制〔地方政府和官員〕與地方產業聚落〔外企〕之間」存在「鑲嵌關係」，頁55)、「公民身份差序」(「民工作為勞力密集產業最重要的剩餘生產者，卻長期被排除在地方成長聯盟之外，體驗着被剝削的經驗」，頁199)等，皆有可觀之處。不過，本書最為重要的貢獻在於通過提出這些概念，在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研究之中，擴展了強調資源使用、以生產組織方式為中心的一種重要講述方式。

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存在兩類研究：一類主要強調市場機制的意義，可以稱為「市場機制論」；另一類着重說明政府的作用，可以稱為「政府作用說」。兩者往往被理解為相互對立的研究^④。然而，這樣兩種看似對立的研究卻具有重要的共通點，共同構成了中國故事的第一種講述方式。具體來說，儘管具體內容不同，但是兩者都將資源配置作為講述的中心，差別只在於「市場機制論」認為市場機制或民營企業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作用是經濟發展的關鍵，而「政府作用說」則強調各級政府或國有企業在資源配置過程之中的作用。很明顯，兩者的要點都在於資源配置以及所有制這一隱藏在資源配置後面更為隱秘的、決定性的變量。由於所有制是生產關係的重要內容，因而這些研究構成了以資源配置和生產關係為中心、欠缺微觀視角的第一種講述方式。

不過，由於資源配置效率和資源使用效率(X效率[X-efficiency])

共同決定經濟發展的成敗，因此，不應該將生產關係和生產組織方式——企業層面的生產活動如何組織起來或技術與勞動如何結合——的關係割裂開來^⑤。更為重要的是，在上述講述方式之下，企業究竟是如何參與中國的經濟發展——這不但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最激動人心的部分，而且是其他後進國家最關心的問題——沒有受到充分的關注。

近年來，一些學者意識到以上問題，逐步發展出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述方式。這些學者程度不同地關注中國工業化進程之中的資源使用問題，直接或間接地從生產組織方式的角度討論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因^⑥。考慮到資源配置和資源使用、生產關係和生產組織方式的內在聯繫，我們有理由認為這些學者開拓的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述方式，構成了對於第一種講述方式的重要補充^⑦。不過，他們所做的或者是抽象的理論推導，或者是具體的案例研究，在兩者的連結上存在空白。筆者認為，本書最為重要的貢獻就在於填補了這種空白，推動了第二種講述方式的發展。

比如，關於工繳費等制度安排的精彩分析是本書的關鍵環節，能夠反映本書對於第二種講述方式的具體貢獻——將工繳費制度的具體案例和「地方成長聯盟」等政企關係概念有效結合。眾所周知，中國的對外開放始於珠三角地區，該地區的早期發展受益於「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加工、補償貿易)政策，但工繳費在「三來一補」特別是來料加工的發展

關於工繳費等制度安排的精彩分析是本書的關鍵環節，能夠反映本書對於第二種講述方式的具體貢獻——將工繳費制度的具體案例和「地方成長聯盟」等政企關係概念有效結合。

過程中的作用並不廣為人知。外企之所以在改革開放初期傾向於進行來料加工，主要是因為中央政府對加工企業實行稅收減免政策。不過，只有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才能享受這一優惠。於是包括台商在內的外企積極地與大陸企業簽訂來料加工合同，「藉加工之名，行外資之實」：在形式上，進行加工的是當地企業，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工廠的實際管理由外企負責（頁87-88）。

當地政府之所以積極推動這種合同是因為可以收取工繳費：中央政府規定，外企的工繳費必須以外匯的形式匯入，地方政府和當地企業可以分別獲得15%的外匯分成額度（頁88）。在珠三角地區，工繳費的金額龐大。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市場匯率與官方匯率之間長期存在差額，所以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匯差來擴大工繳費收益。即使地方政府和當地企業只能控制30%的工繳費，相關匯差收益也相當可觀。比如，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東莞市政府獲得的工繳費和工繳費匯差收入持續超過財政收入。1990年代中期之後，三資企業（以外資獨資為主，頁122）逐步取代「三來一補」企業，加上匯率制度改革導致匯差逐步消失，工繳費收益開始降低。但是，即使在2003年，相關收入仍佔相當於東莞市稅收的68.9%（頁111）。

在這一階段，地方政府開始以各種方式徵收管理費、協作服務費等隱蔽性地方稅收（頁123、298）。為了持續地獲得收益，地方政府不斷以壓低勞工工資和社會保險費率

等方式為外企服務（頁117-18）。在這個過程之中，「地方成長聯盟」得以持續，地方利益集團和外企都獲得了雙重收益：雙方不但各自都獲得了「租金」，而且分別獲得了現代管理方法和市場機會。當然，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樣，這種聯盟在檯面上的參與者是外企、地方政府、當地官員和當地國企或集體企業，中央政府是隱形參與者（頁87）；勞工階層則被制度化地排斥在外，除了欠缺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等方面的保障外，更在教育 and 社保上遭到差別待遇（頁237-44）。

關於最初形成於廣東的「地方成長聯盟」或「分租」聯盟，在本書的分析框架之中居於核心地位。從廣東「地方成長聯盟」的形成回溯，可以發現本書所有分析的起點——價值鏈的全球展開，正是這種展開使得外企（本書特指台商）來到大陸，尋求「租值」；從「地方成長聯盟」的形成向後展望，可以發現「尋租中國」——在作者理解的中國模式中，廣東的「地方成長聯盟」和廣東模式就是其原型。以「地方成長聯盟」為核心的分析，切實地推動了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述方式的發展。透過作者的分析，這種講述方式超越了理論推導和案例研究，充分展示了企業層面的生產活動究竟是怎麼組織起來的這一關鍵問題。

如果說資源配置和生產關係、資源使用和生產組織方式分別是中國故事的兩種講述方式的關鍵詞，那麼這兩種講述方式顯然應該結合在一起。本書的另外一個貢獻，就是有機地結合了兩種講述方式：官僚體系提供的庇護在書中被視為

如果說資源配置和生產關係、資源使用和生產組織方式分別是中國故事的兩種講述方式的關鍵詞，那麼本書有機地結合了兩種講述方式：官僚體系提供的庇護被視為一種「生產要素」，而作為分析框架起點的價值鏈的全球展開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結果。

一種「生產要素」，「官員給予廠商『掛靠』和『保護』，從中獲取收益」，「除了作為遊戲規則的『調節者』之外，也身兼『參與者』」（頁61-62），而作為分析框架起點的價值鏈的全球展開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結果，但價值鏈在中國的治理顯然鑲嵌於「地方成長聯盟」的內部架構之中。

三 對本書的反思

筆者認為，本書可以從兩個方向進行擴展：一個方向涉及具體研究議題；另一個方向涉及中國經濟的本質特徵。

本書圍繞「政策租金」所進行的分析可以作進一步闡釋。第一，1990年代中期以後，各地方政府針對包括台商在內的外企所進行的招商引資競爭日趨激烈。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台商等外企的身份更具稀缺性，它們可以利用這種身份追求「租金」。上述背景與本書的分析思路在總體上是一致的。作者提到台陽公司在1994年中斷與東莞市莞強進出口公司的合作關係，轉而搬遷到納福村，以取得更優厚的條件和優惠稅率，即為一例，但書中似乎欠缺對這一背景的整體敘述（頁161-64）。如果能夠更多地將這些現象納入分析，那麼本書的論證將更具說服力。

第二，作者對於地方政府所進行的「尋租」活動的分析可以更為立體。正如作者強調，這種活動對於經濟成長具有抑制作用：「尋租與成長並存的現象，具有一定的歷

史階段性。當歷史的機會之窗關閉時，尋租就會令廠商與人們無法忍受，而成為『有害的』行為。」（頁349-50）但它的影響可能是多方面的，對於經濟發展的整體影響，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尋租」活動中消耗的資源最終是否會離開生產領域^⑧。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發現，地方政府獲取的部分「租金」實際上投入了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頁6、7），而這種投資對於經濟發展具有正面影響。換言之，如何客觀、全面地評價地方政府進行的「尋租」活動所產生的正反兩面影響並不是簡單的問題，中國故事的微妙之處或許正在於此。

第三，作者將價值鏈的全球展開作為分析起點。但是，其展開的前提是產品的技術特徵或產品建構向模塊化的方向轉變。模塊化指產品的核心部件成為單獨流通的商品；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企業無需內製核心部件，生產過程轉變為採購核心部件並將其與一般部件組裝在一起，生產難度大大降低。中國的電視機、手機等產業就是這樣崛起的。關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產品建構的變化，已經積累了一些文獻^⑨。如果作者能夠注意這些文獻，那麼本書的分析將更為具體。

如果說上述問題主要涉及具體研究細節，那麼下面的討論則是與本書的主要貢獻有關的理論問題。本書發展了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述方式，即重視企業層面的生產活動究竟是如何組織起來。但是，一旦將生產組織方式置於分析框架的核心，我們會立即注意到生產組織方式在中國經濟內部的多樣性問

「尋租」活動對於經濟成長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地方政府獲取的部分「租金」實際上投入了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如何客觀、全面地評價地方政府進行的「尋租」活動所產生的正反兩面影響並不是簡單的問題。

作者指出廣東模式是蘇州模式和溫州模式的起源，強調廣東模式既是中國模式的原型，也是各區域發展模式的典型。對於生產組織方式，本書作者更為重視時間上的可變性，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空間上的多樣性。

題。在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傳統中，這個問題從來都是研究重點。雖然相關研究主要指涉不同國家之間的多樣性，但是並非沒有關於國家內部的多樣性的分析，應予以參考^①。

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經濟之中至少存在以外企為中心的廣東模式、本土民營企業佔據關鍵地位的浙江模式和國企主導的內陸模式。作者意識到了這一問題，認為應該將地方政府的行為放在比較的框架之下進行研究(頁44)。但是本書的處理略顯簡單，並未進行類型學分析，反而採取追溯歷史起源和演進的方法，指出廣東模式是蘇州模式和溫州模式的起源，強調廣東模式既是中國模式的原型，也是各區域發展模式的典型。一般來說，比較政治經濟學研究強調生產組織方式在時間上的可變性和空間上的多樣性。相對而言，作者更為重視時間上的可變性，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空間上的多樣性。

作者低估中國經濟中生產組織方式的多樣性亦與本書的分析框架有關。如前所述，價值鏈的全球展開被置於分析框架的起點。這意味着作者高度重視國際分工體系的影響，將中國的經濟發展理解為朝向外向型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頁52)。在這樣的分析視角之下，具有強烈的外向型特徵的廣東模式自然被視為中國模式的代表，而那些外向型特徵不突出或外企影響不明顯的地區的發展模式就容易被忽略了。

筆者指出生產組織方式存在多樣性並不意味着否定本書的學術價

值。本書的核心論點是台商塑造廣東模式、廣東模式是中國模式的原型。實際上，在引入多樣性的視角後，只需將核心論點微調為廣東模式是中國模式的原型之一即可。這種微調當然無損本書的主要學術價值。

四 餘論

本書的寫作以作者在廣東、長江三角洲地區、浙南溫州地區、鄭州、北京、四川等地進行的大量田野調查為基礎。正如海外華人資本對於大陸的經濟發展具有關鍵作用，海外華人學者的分析視角對於理解大陸的經濟發展同樣具有重要價值。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劇烈變動、重組的當下，筆者期待包括本書作者在內的海外華人學者能夠一如既往地關注大陸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註釋

^① 比較重要的研究，參見 Yingyi Qian and Chenggang Xu,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 no. 2 (1993): 135-70; Hongbin Li and Li-an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no. 9-10 (2005): 1743-62; 章奇、劉明興：

《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基於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經驗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

② 宋磊：〈中國故事與中國模式的第二種講法——以路風《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為例〉，《文化縱橫》，2016年第3期，頁62。

③ 筆者在2019年上半年關於襯衫出口企業的調研表明，香港溢達集團在生產流程、研究開發、勞工福利、社會責任和環境保護等方面一直是大陸企業公認的模範。或許，不同產業之中的港台企業的角色並不相同，同一產業內部不同企業之間的差別也不宜完全忽視。實際上，作者也認識到了台商在技術上有一定優勢（頁318）。

④ 「市場機制論」者重視的市場包括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因此「市場機制論」實際上存在兩個版本。類似地，「政府作用說」同樣存在分別強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用的兩個版本。將「市場機制論」和「政府作用說」區別開來的，不是重視市場或政府的作用與否，而是在多大程度上重視市場或政府的作用。參見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Ronald Coase and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賀大興、姚洋：〈社會平等、中性政府與中國經濟增長〉，《經濟研究》，2011年第1期，頁4-17；史正富：《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⑤ Harvey Leibenstein, "Allocative Efficiency vs. X-effici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 no. 3 (1966): 392-415; William Lazonick,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⑥ 參見宋磊、孟捷：〈富士康現象的起源、類型與演進〉，《開放時代》，2013年第4期，頁125-36；路風：《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吳介民注意到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的研究，正確地指出他對中國經濟的描述過於浪漫（頁46-47），但沒有意識到他率先將生產組織方式置於研究的中心，而這種研究方法和本書是一致的。參見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Verso, 2009)。

⑦ 宋磊：〈《光變》：從中國製造的來龍去脈到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法〉，《中國圖書評論》，2017年第7期，頁124-28。

⑧ Mushtaq H. Khan, "Rents, Efficiency and Growth", in *Rents, Rent-seek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in Asia*, ed. Mushtaq H. Khan and Jomo K. 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2.

⑨ 參見Carliss Y. Baldwin and Kim B. Clark, *Design Rules: The Power of Modular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藤本隆宏、新宅純二郎：《中国製造業のアーキテクチャ分析》（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5）。

⑩ 參見章奇、劉明興：《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Lei Song, "Modular Mode of Production, Chinese Style: Origin and Evolution", in *Evolving Diversity and Inter-dependence of Capitalisms: Transformation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U and Asia*, ed. Robert Boyer et al. (Tokyo: Springer, 2018), 382-84。